

冯承钧译著集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多桑蒙古史（上册）

〔瑞典〕多桑 撰

冯承钧译著集

# 多桑蒙古史（上册）

〔瑞典〕多桑 撰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多桑蒙古史 / (瑞典)多桑撰;冯承钧译. —上海:  
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4. 3

(冯承钧译著集)

ISBN 978-7-5325-6245-9

I. ①多… II. ①多… ②冯… III. ①蒙古族—民族  
历史—研究—中国—古代 IV. ①K281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21056 号

冯承钧译著集

多桑蒙古史

(全二册)

[瑞典]多 桑 撰

冯承钧 译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网址: [www.guji.com.cn](http://www.guji.com.cn)

(2)E-mail: [guji1@guji.com.cn](mailto:guji1@guji.com.cn)

(3)易文网网址: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32 插页 4 字数 692,000

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,500

ISBN 978-7-5325-6245-9

K·1499 定价: 78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## 译 序 （一）

一部《元史》，历来囿于“正史”成见的人皆说不好，所以陆续改编了些《续编》、《类编》、《新编》、《译文证补》、《蒙兀儿史记》、《新元史》。这部历史好像是犁然大备，其实不然。修史首重在搜辑史料，而修《元史》尤须要通晓几种外国语言；不解外国语言，不但不能搜辑外国史料，而且不能解释本国史料。更有进者，外国语言不可偏重一种，像现代有些人认定除英语外无外国语的例子，是不对的。《译文证补》就犯这种毛病。此书虽然引用了许多“西域书目”，好像他是全凭译人口述而“笔受”的。不仅未见波斯语阿剌壁（Arabe，今译阿拉伯）语种种撰述，而且多桑的书好像也是从霍渥儿特（Howorte）书转录的。洪氏证补《元史》之功固不可没，可是他有一种成见误人不浅，他说西方语言无某音，不及汉字译音之备，此说很不可解。若说用标音字母译写的名称，不及音义有变化的汉字之备，未免很奇。他在《译文证补》里面，根据译人的口述，改了许多《元史》固有的地名、人名，比方《元史》译 Heri 作也里，《元朝秘史》作亦鲁，皆有译例可寻，可是洪氏根据晚见的 Herat 译作海拉脱，似乎只知其一不知有二三了。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。他这种创译，苦了后来续修《元史》的人。所以

《新元史》的阿儿浑,在此人本传中作阿儿浑,而在《旭烈兀传》同《西域传》中又作阿儿衮;这种毛病皆是不能径读西书所致。

所以我想将多桑这部《蒙古史》翻译出来,此书出版虽已有一百多年,然而研究蒙古史的人,仍不能不拿来参考,因为《世界侵略者传》、《史集》、《瓦撒夫书》等书没有完全译本以前,终不能不取材于是书。按多桑书共有七卷,前三卷述成吉思汗至元亡时的事迹,后四卷专言伊儿汗国的史事,并附带言及钦察、察合台两汗国。其第一卷业经田中萃一郎译为日文,译文还忠实,可是有许多人名地名未取元代载籍的固有译名比对。第二、第三两卷记成吉思汗以后之事,然多取材于中国史书的译文,所本的汉籍,以《续通鉴纲目》、《元史类编》两书为最多,偶亦采用《元史》。然而于《元朝秘史》、《圣武亲征录》等书皆未引用,当然说不上《黑鞑事略》、《蒙鞑备录》同元人文集中的许多碑志、行状、家传了。所以我译此书,先从后四卷译起,将来如有余暇,再译比较西方材料较多之第二卷。

多桑书所本之书有二三十种,也有人名、地名不统一的毛病,尤其使人讨厌的,就是他叠床架屋式的译写方法,然而也无可如何,不启用新式译写方法将他改正。霍渥儿特书第四册的索引译写比较简单,可以取来对照。

我原想用白话翻译,不用“史书文体”,可是渐渐不知不觉地受了史书文体的支配,然而我始终力避用“典”。我的目的惟在将此书原意译出,供他人作史料参考之用,所以对于译文只求忠实,不去锻炼字句。在别人看起来,我译的这部书或者比从前的译文退步,然而我觉得译文通畅的地方,容或有点削足适履;文义涩滞的地方,容或确可比对原文;所以宁愿拖泥

带水,而不愿钩章棘句。

从前编纂《元史》的人,除开屠寄以外,皆有译名不一贯之病;所以我在翻译中,对于人名、地名,颇为审慎。凡人名、地名皆以《元史》、《元秘史》两书为主,两书所有的,选用一名。两书所无的,地名一项,尽先采用唐、宋、明人的译名;人名一项,元代载籍中有同名的,如帖木儿、不花、阿里、护都不丁、阿合马、亦思马因、阿老瓦丁、马合谋之类,虽非本人,亦用旧译。元代载籍中无可比附的,则务求合乎元人的译法,不敢以今人的读音,认作元人的读音。元人的译法在不明语学的人看起来,好像不对,比方将-l 读作-n,就是一个例子。殊不知这种代替方法,从前也有,而在元代竟成一种通例,所以译 sultan 作算端, Djelal-ud-din 作札兰丁, Ilтчikadaĩ 作宴只吉带。这皆是翻译本书所用的正例,然而有时因为下述种种理由,不能不用变例。

元代除开一个最短期间用八思巴字母外,始终用的是畏吾儿字母。畏吾儿字母中无代表 g-、h 的字母,所以蒙古文中多缺此种写法。唐时突厥语的莫贺咄,移植到蒙古语中,应读若 bagatur,可是在蒙文《元秘史》中写作把阿秃儿,则成 ba'atur;在《元史》中更简作“拔都鲁”,则成 batur。又一方面,阿剌壁字母中不常著录韵母,所以有许多名称写法不一,姑就此把阿秃儿一字而言,本书竟有写作 Behadir 者,我当然不能按着字面翻译,而将他改作八哈都儿。此变例一。

回教人的名称,无所谓姓,加之名字相同,要使许多同名的人有别,所以在名后加一别号,如用职务官称之类;再不能判别,则于名后注某人之子,如 Ibn Ali,犹言阿里之子之类;或者还要加上一个地名,如报达人、竹维因(就是《译文证补》的

志费尼)人之类。然而也有无从判别的,所以我将这类的译名,略为变通。如《元史》中的 Argoun,是种族名,是军名,亦是人名,《元史》为判别这些名称,将他写作阿儿浑、阿鲁浑、阿里浑、阿刺浑几种写法。我也仿照这个例子,皆分别著录原文于下,可是也有不能分别的地方,本卷中有三个秃儿罕可敦(Tourkan Khatoun),究竟是二人是三人,无从知之,此种名称只好用一贯的译法。此变例二。

本卷中有些译名,看起来好像是变例,其实是正例。比方钦察汗国侵入波斯的统将名唤 Nogai,《译文证补》将此名译作诺垓,其实此名也是蒙古时代的一个通常名称,与他同名的人,在《元史》中颇不少见。我们姑将《元史》的译例来解说。《元史》(我所指的当然是未遭乾隆校刊劫的《元史》)定宗后名唤斡兀立海迷失,就是西书的 Ogoul Gaimisch,可见海字对 gai。蒙古人的官号 Noyan,在《元史》中写作那颜、那演、那衍,可见那字在元时读若 no,对照起来,Nogai 应该译作那海,而不应改作诺垓,这类例子很多,姑举其一,以概其余。

还有些译名,可以说是正例,也可以说是变例。旭烈兀有个儿子,在此书中(第五卷)写作 Councouratai,《译文证补·阿八哈补传》写作空库斡台,《蒙兀儿史记·世系表》作空古斡台,《新元史·旭烈兀传》作空古斡儿,然在《台古塔儿传》又作康廓而拉台,其实皆被多桑叠床架屋的译写方法所误。按元代的蒙古人,常用些部族名称作人名,仅在后面加上一个接尾词,大概男名加“台”,女名加“真”。这些用部族名称而自名的人,并不是本部族的人,比方南家台或囊加歹,并不是中国南方的人,马札儿台也不是匈牙利人,乃蛮台也不是乃蛮人,不过取其名而已。此处的 Councouratai 也是此例。多桑

所取的材料来源不同,写法因之有异,其第一卷后附注所引《史集》诸部族名,有 Councarat,就是此人名之所本,也就是《元史》所常写着的弘吉刺,此名在《辍耕录》中作瓮吉刺,在《辽史》、《金史》中作王纪刺、广吉刺,用新式写法,应作 Qongirat 或 Ongirat。头一字何以有时用声母,有时不用声母,我现在还不能答覆这个问题,我们不能拿畏吾儿字母来解释,因为辽、金时代蒙古人还未用畏吾儿字母,可是第二个字的韵母在汉译皆用-i,所以我将这个人名更正为弘吉刺台,这个译名初视之好像未遵原文,其实我有我的理由。

本书有若干地名,我明知有误,然而未能确证其误以前,只好随他。比方旭烈兀进攻木剌义时,有个地名作 Khar,按照霍渥儿特《蒙古史》所引 Quatremère 译本《史集》,此地名是 Khowar,则即是《元史·西北地附录》之胡瓦耳。然而我不敢改正,仍然译作哈儿。又如本书中之若干地名,似乎应该“名从主人”,不应用欧洲语言的名称。比方埃及不应名曰埃及,而应名曰密昔儿(Misr);美索波塔米亚(Mésopotamie)应改作 Djézireh。可是我是译书,而不是在考订,所以也不便改他。然而有时也有点变例。阿剌壁语名阿母河曰 Djihoun,此河元代本有阿梅、阿母、暗木等译,所以我习用旧称,不用新译。本书称阿母河以外的地方曰 Transoxiane,原意犹言“乌浒水外”,译用这个名称,未免太僻;若用康居的名称,未免太古。元时在此地设阿母行省,可是这个行省所管的区域,好像在最初时西及波斯,东兼《元史·西北地附录》之途鲁吉(Turki),不能将这个名称代表两河之间的地域。考此地阿剌壁语之原名作 Maveraun Nehr,此言河中,西辽时于其地置河中府(见《湛然居士集》及《西游记》)。我所以将此地译作河中,其地既在西



域,决不致同蒲州发生混解。

译名一贯之重要,取下面所引的一段《新元史》观之,就可知道了。《新元史》卷二五六(12页)云:“西里亚,埃及属国,以他木古斯为都城,埃及与蒙古隔绝不通使命。宪宗初,西里亚酋纳昔儿商拉哀丁耶思甫取埃及之塔木司古司之地,后为埃及苏而滩哀倍克所败,纳昔儿乃割基纳斯列母克渣及纳蒲列斯海岸以请平。”按此处的他木古斯同塔木司古司,明明是一个地方,不知为何用两个译名。此城就是我所翻译的大马司。此城古称同现在英文仍旧袭用的名称,固是 Damascus,然而我只能从原书法文名称之 Damas 而译作大马司。《新元史》的纳昔儿商拉哀丁耶思甫,就是多桑书的 Nassir Salah ud-din Youssof,我翻译的纳昔儿撒刺丁亦速甫。《新元史》的译法,除开“商”字外,尚可勉强对付,可是后面的“基纳斯列母”,要叫元朝的人读起来,势须作 Kinasremou,同多桑书的 Jérusalem 未免相去太远了。况且这是基督教人的圣地,通常译作耶路撒冷者,不知为何发生这样的讹译,大约是翻译的人太无史地常识,而撰修的人未能校对原文所致。由这一方面看起来,可见修《元史》不仅仅要通晓与《元史》有关系的若干语言,而且还要抛弃中国字古今读音不变的成见。其实我于此道不敢自认高明,我原想等待伯希和所译写的蒙古文《元朝秘史》刊行后,考究元代的读音,再就考究的结果,来整理元代载籍的译名。哪晓得等待了十四年,除开片段的发表外,全书尚未出版,所以于译此书时,不敢自认译音之必是,将所有的人名、地名皆附注原文于下;然不能遍注,只以初见者为限。有时一名两三注者,或因原名有详有略,或因一名写法两歧,或因前后文相距太远,所以一再著录。

读者还要注意的,不仅多桑书所著录的名称不一致,或有误写而必须考订的地方,而且他所本的史料,也不免讹夺。现在姑举一例来说,《史集》记载从大都赶上都的道路有三,第二路经过一城名曰 Djodjou,此城附近别有一城名曰 Simali,后一个名称就是长城附近的洗马林堡。可是 Klaproth、Yule、Blochet 诸人皆说前一地是涿州,在音的方面固然可以将就,在地理方面可就难了。现在从燕京(读者恕我不用这个很不祥的北平名称)到多伦西北八十里之古开平府,何至于假道燕京西南一百几十里的涿州,足证刺失德(Raschid)书传抄有误。伯希和在《亚洲学报》(1927年刊)说是抚州之误,这种考订是不错的。可见不仅读多桑书要审慎,就是读他所本诸书的原文或译文,也要审慎。本卷中所言的狮符,明明是虎符之误,新修元史的人过于重视西方载籍,常将虎符改作狮符,然则《元史·兵志》“佩金虎符符趺为伏虎形”的记载,竟成狗矢了。

本书所引诸书,皆用省称,因为在第一卷卷首已有说明所以不赘,我的译文既从第四卷起,故将诸书目简单著录于后,以明出处,原书可惜无索引,将来如有余暇,容或补加于全书之后云。

1933年6月1日冯承钧识

## 译 序 （二）

多桑书共有七卷。我前以为西域三大汗国的史事，在旧籍中颇欠缺，在新编中亦多疏误，故先将后四卷译。后来看见田中萃一郎所译的前三卷，我又觉得全书仍有翻译之必要（田中的译文我在《大公报》图书副刊第十四期中已有评），遂又将前三卷转为汉文。翻译时间既有先后，前三卷同后四卷的译名不免有若干不能一致的地方。比方 Mohammed 先译作“漠罕默德”，后在前三卷中概从唐译作“摩诃末”，就是一个例子。全书译竣，我想将后四卷取回整理，不意原稿清样统已制成纸型，势须大加挖改，末后只好听他。拟在索引中去补救。

我从前在第四卷序中说过，多桑书同《元史》一样，也有译名不一贯的毛病。因为他所本的回教撰述，文字不著韵母，而声母音点有时脱落，常易相混，所以不特相近的韵母有时误用，甚至难于互用的韵母，也能混淆不分。声母之误若无他书可以对勘，竟至无法考订。比方主儿勤之误作 Bourkines，错了一个声母，那牙勤误作 Boucakines，竟错了两个声母、一个韵母。他最使我感困难的，就是对于 c、k、g、kh、gh 等声母毫无分别，例如他译写的 gan，对音可作干(gan)，又可作坚

(gän),且可作罕(ghan,khan)。这种困难有时还可以用前后文去补救,例如 Togan,不难认识是脱欢。可是他有时又将 o 同 ou 两个韵母互用,写作 Tougan,则未免使人犹豫不决,因为蒙古人也有名唤秃坚的。像这一类的困难不计其数,我自信尚未能完全将他解决。

此外有些译名,好像与对音未合,其实不然。我在第四卷序中曾引证过若干变例,比方将-l 读作-n,畏吾儿字母中无代表 g、gh 等声的字母,就是两个大变例。此外尚有若干为前序所未及的,条列如下:

突厥语发音之 y,在蒙古语中常变作 j。比方突厥语驿站作 yam,蒙古语改作 jam。突厥语法令作 yasaq,蒙古语则改作札撒黑(jasaq)。讹答刺城的守将,杀成吉思汗使者的那个人,刺失德书名亦纳勒出黑(Yinalčuq),号哈亦儿汗(Qayir-khan),而在《元史》则作哈只儿只兰秃(Qajir-Jinaltuq)。除以蒙古语语尾之-tuq 替代突厥语语尾之-čuq 外,两个 y 皆变作 j,一个 l 变作 n。这种例子举不胜举。

蒙古语同西域语常将 b 变作 m,若乞卜察黑(Qibčaq)之变作钦察(Qimcaq),哈卜哈纳思(Qahqanas)之变作憨哈纳思(Qamqanas),是两个很显明的例子。

蒙古语对于发音之 r-,常叠用其后之韵母,比方 Ros 之作斡罗思(Oros),Riazan 之作也烈赞(Äräzan),也是两个很显明的例子。这种译法同古译相反,比方《宋高僧传》卷三有阿你真那(Ratnacina),竟将发音的 R 简单删了,大约是汉语同蒙古语无此发音,所以读音或增或减。

发音之 A 有时省略,比方 Abu Saïd 之作不赛因,Abu Bâkr 之作不别,是见于《元史》的变例。可是也有帖木儿的后人

Abu Saïd 在《明史》中写作卜撒因的。看这个例子,足见收声之-d 偶亦变作-n。但是这种变例的收声不常见。

蒙古语尾之-n 增删无常。若阿勒赤(Alči)亦作按陈(Alčīn),河西转为合失(Qaši),也可变作合申(Qašin),月忽难(Yohunan)又可作月合乃(Yohuna-i),这个月合乃在《元史》卷一三四误作月乃合,诸本《元史》皆然,可是此人的神道碑实作月合乃,这个名称大概也是从突厥语转贩而来的,在蒙古语中则变作朮忽难(Juqunan)。

蒙古语常读t作d,比方将tarqan读作答刺罕,将taïr读作答亦儿,就是两个很显明的例子。这种读法好像不是蒙古语所独有的,从前汉译tarqan曾作达干,Turküt曾作突厥。

上面所说这些变例,不但是译多桑书所应知道的,就是读《元史》也是应该知道的。至若我所用以译写的汉字,我很想适合当时的读音。因为翻译非汉语的人名,固然要求一贯,可也要注意当时的读法。我曾说过,如要整理《元史》译名,必须备具几种条件:(一)要名从主人;(二)要了解西方北方几种语言;(三)要明白汉字的古读,尤要知道元人的读法。从前整理《元史》的人,好像多未备具这三个条件,所以愈改修愈使人迷离不明。比较以前的整部成绩,只有那珂通世的《成吉思汗实录》微合第二第三条条件,可是他常将《元朝秘史》的译音译写近代西文地名:将契丹改作乞坛(Qitan),还可以说是乞塔惕(Qitat)的单数;将波斯作珀儿昔阿(Persia),也可勉强对付;可是将埃及作额只魄惕(Egypte),而不用名从主人之例,作密昔儿(Misr)等类的译法,未免过于刻舟求剑了。但是比较其他改修的《元史》,总算强多了。在学界种毒最深的,要首数《元史译文证补》的译名。洪氏丝毫不问上述的三个条件,

同元代译名的那些变例,对于《元史》名称妄加改窜:比方译 Catchoun 作哈准,而不用元译的合赤温或哈赤温;译 Noqai 作诺垓,而不用《元史》屡见不鲜的那海或那怀,自以为新,其实错了。古人翻译,很明了汉字的读音,比方《圣武亲征录》中由西夏攻至汴梁的蒙古将,译名作三木合拔都,后又作三合拔都,此人的原名是 Samuqa Ba'atur,翻译的人用“三”(古读 sam,今粤人尚作此古读),照顾到第二个字的发声。这种译法就是从前佛经的译法,也就是《元朝秘史》的译法,不像今人随使用本人乡土的方言,同似识非识的汉字,译写外国语言名词之乱。所以《元史》中的译名虽不统一,除开过于省译之名称外,皆不难复其原名。至若《元史译文证补》一直到《新元史》的译名,能够还原的恐怕很少。

我所用的标准译字,多从《元朝秘史》,然而并不认定《元朝秘史》是一部完全不误的译文,其中也有些传写的错误。比方将你沙不儿(Nišabur)写作亦薛不儿(Isäbur),将亦剌合(Ilqa, Ilaqa)写作你勒合(Nilqa),可以说是音点不明,致有此误。可是杀乃蛮王子古出鲁克(屈出律)的地方作撒里黑昆(Sariq-qun),证以近来发现的蒙文《秘史》残本,实是撒里黑豁勒(Sariq-gol)之误。如此改正方与蒲犁县之土名相合。这类版本的错误,《秘史》中尚有不少,所以我虽采用此书,可不绝对盲从。

旧译名除开过于省译的名称,像忽亦勒答儿(Quildar)《元史》作畏答儿的例子外,我皆尽量采用,决不自出心裁,妄易新翻。元代载籍所无之人名、地名,而有旧译者,则用元代前后之古翻,如隋唐之范延,《明史》之帖卜利司之类,亦不别用新名,不用今读之字译古名,也不用古读之字译今名。凡原名初

见者,皆附西文原名于下。可是对于多桑书所采乾隆时妄改的名称,根本既有错误,西文译写之名除不误者外,概从删弃。好在多桑书的精华全在回教著作,他所转贩的那些汉籍副料(以《续通鉴纲目》为最多),应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整理。

多桑书所引刺失德书很多,而刺失德书同《圣武亲征录》并出一源。在刺失德书未直接转为汉语以前,我觉得多桑书是一部很好的参考史料。比方《亲征录》所载木华黎率王孤、火朱勒、忙兀、弘吉刺、亦乞刺五部,以及契丹女真之兵南侵中国一文,其中的火朱勒部,久之未详其对音为何,今观多桑书,知为 Qošiqlol。然则《亲征录》原译或是火失火勒矣。刺失德书(Berezin 本数见此名)说是每十人队中挑选二人组织成的军队,此说颇类真相,因为此字的字根是 qos,突厥语犹言双也。此姑就以多桑书校正中国史录而言。反一方面说,也可取中国史料校正多桑书。兹举一例为证:多桑书第一卷第二章有个部落,名称曰亦勒秃儿斤(Ilturkine),后在附录中亚部族表中,又作亦勒都儿斤(Ildurkine),检《元朝秘史》卷六相对之文(叶本 31 页),王罕有个使臣名亦都儿坚(Idurgän),后(49 页)同一人又作亦秃儿坚(Iturgän),也是一名两种写法,姑不问究竟是人名抑是部名,要可以《元朝秘史》的名称改正多桑书之误。

我译多桑书时,很想作一种互证的工作,所以在第一卷第二章中用力很勤,可是费时也很久。如此做下去,恐怕几年也译不完,后来只好译而少证。

我在本序中所用的译写方法,除引用多桑原文外,皆用新法。因为多桑书之叠床架屋的译写方法太累赘,并可发生误会。比方谷儿只王 Lascha,《蒙兀儿史记·西域传》误读作辣

思伽,其实应作刺沙(承袭此人王位的鲁速丹,就是刺沙之妹,然而新修的《元史》迄未认清是何人,《蒙兀儿史记》误作刺沙之甥女,《新元史》误作刺沙之弟妇,大约是习于中国观念,以为只有弟媳妇摄政,哪有姑奶奶当权,是不特不明西史,而且并 Howorth《蒙古史》的世系表亦未寓目)。若是用新法写作 Laša,就不至于发生这类的误读了。我译多桑书常想将他的译名修改。可是他的写法无一定标准,有许多名称很难判别,末了只好听他,仅在汉译名中略为变通。所以 dji 常译作“赤”,而不作“只”。再者多桑的译名皆作“法语化”,比方蔑儿乞惕已经是蒙古语表示多数的名称了,应该写作 Merkit,可是他写作 Merkites,另外又添了一个法语多数,弄成画蛇添足。要是遇见一个翻译匠,一字一音地当作英文读去,恐怕最博识的考据家也无从考见真相了。这也是读多桑书应该注意的一点。蒙古语表示多数的语尾固然是-t,《元秘史》写作“惕”,可是因为采用别的语言,或因他种原因,有时多数作 s、r、l,《元秘史》写作“思”、“儿”、“勒”。比方南家思(Nankiyas)、速勒都思(Suldus)、巴鲁刺思(Barulas),用“思”而不用“惕”,札刺亦儿(Jalaïr)、塔塔儿(Tatar),用“儿”而不加“惕”,撒儿塔兀勒(Sarta'ul 就是回回),用“勒”而不改“惕”,皆可为证。我还疑心有用-n 字作多数的。晃豁坛(Qongotan)的多数固作晃豁塔惕(Qongotat),乞颜(Qiyan)的多数固作乞牙惕(Qiyat),为甚么乃蛮(Naiman)不作乃马惕(Naimat)呢?元代固有乃马台(Naimatai)、乃马真(Naimajin)的人名,这不过是蒙古语变化的属格,不足证明他是多数。检遍《元秘史》,竟未发现乃马惕的写法,不论单数多数,皆作乃蛮。要说乃蛮是数目字(此言八),为甚么朵儿边(Dorbän,此言四,亦是部族名)有朵儿伯惕



(Dorbät)的变化呢?若要解决这个问题,非比较阿勒台(Altaiques)系语言不能得到答解。我所举的这些例子,无非使人知道蒙古语多数不仅用惕,切莫仿效《蒙兀儿史记》,不但将蒙古语的多数一概变作惕,而且将非蒙古语的多数,甚至将梵语的多数,一概变作惕。

我这些批评,并不是在摘人之短而见己长,不过是因为有几部书已经具有“威权”。我译本书撰者 C. d. Ohsson 的名称,不敢规规矩矩译作朵松,而仍用旧译的多桑者,也是受了这种威权的影响。这些具有威权的撰述,不能说全书皆好,当然有些缺陷,我无非指明这点缺陷,使参考的人不致沿袭其误而已。除开此点以外,我以为别烈津本的刺失德书未重译以前,《元史译文证补》一书是可以参考的,《成吉思汗实录》、《蒙兀儿史记》二书,也是治元史的人离不开的佳作。

我译此书也不敢说好。从前在评田中所译多桑书一文中,曾经说过:“多桑书中错误散见,欲改之则与原文异,不改则与事实违,无论何人译是书,终不免吃力不讨好。”所以多桑书出版逾百年,尚无一人敢有翻译全部的勇气或傻气。我今竟敢将此书全部转为华言,只望读者谅我胆量之大,不敢望读者誉我译笔之工。

1934年4月10日冯承钧识